

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與環境變遷（1368-1958）》，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416頁。

歷史上海洋生物種群結構和魚類資源數量的變化，無非有三個原因：一是人為因素的影響，二是自然環境的變化，三是生物群體自身的變化。有關海洋生物史的論述十分少見，歷史學家主要關注與漁業的歷史，如漁業政策、漁民、生產工具和水產品的加工，也即是上文提及的人為因素。誠然，人為因素對於海洋生物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但過分關注「人」而忽略自然環境和生物群體，將使問題的結論出現偏差。Micah S. Muscolino 的《帝國晚期和近代中國的漁場戰爭和環境變遷》（*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認為人口壓力和國家政策是導致舟山海洋資源衰竭的主因，而李玉尚的《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與環境變遷（1368-1958）》一書是對 Muscolino 誇大人為因素影響的反駁。他認為，將海洋環境變化的因素納入考慮範圍，將會改變對中國周邊海區發展歷史的傳統看法。

第一章討論水產制度和漁業資源，清末以前對漁業之管理在於對「人」的控制。直至清末海洋漁業資源方體現其重要性，1949年後國家更以壟斷漁業的形式控制漁業資源。第二章討論中共建國初期牟平和蓬萊縣漁業生產的具體情況，表明豐歉變化經常發生，生物種群結構也有根本性變化，人為和自然因素同時產生影響。第三章討論漁鹽的供應問題，因傳統時期交通不便，漁鹽供應的變化和價格的高低將左右漁業產量，漁民對水產品的選擇也有變化。以上三個章節為第一部份，主要討論人為因素對海洋生物種群結構的影響和漁業發展的相關情況，但同時指出，即使在人為因素急劇加強的近代，自然因素的影響仍不可小覷。

第四章討論海洋動物之生物學體徵，因「某一種群的種族延續受到威脅時，種群個體會通過減少體長、減輕體重、提早性早熟等方式應對」。第五章對魚汛的變化和水溫變化進行比較，發現海水溫度變化對魚類種群結構、數量和魚類汛期產生影響。

第六章至第九章以鯉魚為研究對象，藉此了解海洋環境變遷。第六、七、八這三章從傳統文獻中尋找鯉魚的相關敘述，勾勒出明代至清末黃渤海海域鯉魚的變動情況。例如第六章有關水溫之記載，作者試圖通過文獻中赤潮的發生情況表明海水溫度的變化，由此得出洋流對魚群的影響。第七章在

利用傳統文獻材料了解鮭魚變動的同時，討論了黃渤海沿岸村落的人口來源和開村傳說，指明村落的建立和青魚旺產的關係。可見人為因素影響魚群變動的同時，自然環境的變化對人類社會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第八章討論了1815年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爆發對遠及黃海的鮭魚群數量和汛期變化的影響。第九章則利用數學模型對第六至八章的文獻數據進行處理。此一部份可以看出，作者意識到僅僅採用傳統史料是遠不足夠的，通過歷史文獻和數學建模的結合、域外材料的使用、水產檔案的運用和口述及傳說材料運用的方式，試圖以物理海洋和海洋生物作為突破口，選擇鮭魚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通過歷史文獻的記載和現代水產數據的記錄，利用鮭魚種群數量和海水溫度的相關性，大致勾勒出有準確漁業資料以前的海洋環境變化，並得以明確漁業豐歉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

清末以來石首科魚類的小黃魚接替青魚成為主要的經濟魚類，因此第十章主要討論石首科魚類的種群變動。作者認為小黃魚的資源數量變化應與18世紀以來的降水量變化有關聯。第十一章討論真鯛資源的變遷，因為明代以來真鯛一直未有大規模的開發，因此得以忽略人為因素的影響而着重討論自然因素對魚群結構和數量的影響。第十二章討論中小型河流對魚類分佈和數量的影響，同樣也是關注於自然環境對魚群結構的影響，從而又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發生作用。

最後一部份為總結。作者認為，人類歷史在受到自身影響的同時，也因環境變遷而發生改變。小至河流變動改變某一地域的社會結構，大至火山爆發對全球氣候和人類社會整體的影響。對海洋生物的探討是在直接材料記載不足的情況下研究者了解過去環境變化的途徑之一。其次，縱使人為因素對海洋生物結構的變化造成一定影響，自然因素不可忽略。清末以前中國周邊海域的海洋生物資源未受到人類的大規模影響，因此提供了觀察純自然環境變動下的海洋生態系統的絕好案例。

本書作者的着眼點在於觀察海洋生物結構和數量在歷史上的變化，藉此勾勒出明代以來黃渤海一帶的環境變遷，並試圖探討環境變遷的本因以及對人類的影響。因此，作者最為根本的着眼點似是環境變遷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本書探討的黃渤海的魚類一方面是了解環境變遷的一種媒介。另一方面，魚類資源作為自然環境的組成部份，也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特定的影響。因此，本書與傳統的海洋生物史的研究旨趣是不同的，其終極關懷應該還是「人」。它又區別於漁業史及海洋史研究，其研究的主題是魚類資源而非社會和制度。重新回顧本書的結構，第一部份探討人為因素對海洋生物結

構的影響。第二部份討論生物種群結構自身的變化。第三部份以鮭魚為突破口討論海洋生物結構和自然環境的關係。後文又談及小黃魚和真鯛的開發、利用和資源變化。三個部份討論了三種關係，行文中都提及環境和魚類變化對人類的影響，而人本身又非作者試圖探討的主體，但作者的終極關懷又似以人為本。因此本書的篇章佈局看似嚴謹，但各部份的連貫性不強，關注的重點也有不同，着力點過於分散。但是，作者以魚類作為探討環境變遷的突破口，利用傳統文獻為底本，引用數學模型進行分析，又充分運用了現代的水產檔案，其材料的運用和處理着實令人大開眼界。

姚滂

中山大學歷史系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331頁。

客家研究近年成為臺灣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但是，真正質疑歷史上的「客家」書寫，與今日客家族群之間的差距，並在堅實的歷史材料基礎上，重新還原這些客家移民先祖早期移臺與定居歷史過程的著作，卻並不多見。李文良新著的出版，無疑讓人眼前一亮。

作者關注的臺灣南部六堆地區，位於今高屏溪（清代稱為下淡水）的右岸。這裡是臺灣社會常說的兩大客家聚居區之一（另一是北部的桃竹苗地區），現在當地的居民也自稱為客家人。不過，正如其書名展示的，客家二字被加上了引號，表示他對於這一標籤不假思索地貼在300年前的移民身上，深表懷疑。在他看來，今日六堆客家人的先祖們，他稱和自稱的身份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變化，背後恰恰反映了在清初領臺之後，至乾隆末期百餘年間，地方社會由開拓至形成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中地方社會如何與國家互動，尤其是國家行政如何執行，米穀商業發展以及地方動亂對地方社會的影響等，是他強調的重點。

這些客家人到底何時入墾臺灣南部地區？作者在第一部份提出了這個問題，不只是想要追溯事實，更挑戰了一些常見的理解模式。雖然當地契約文書表明，在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代）大量客家人開始入墾該地，並且形成「閩主粵佃」的格局，對此作者卻有着迥異的看法。通過他的描述我們得到